

啟蒙主義的當代命運

• 薛毅

一

汪暉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的一個重點是對80年代中國啟蒙主義的重新評價，這與他重新認識啟蒙主義的批判對象及其變化密切相關。在他看來，啟蒙主義把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反思理解為對傳統和封建主義的批判，「從而迴避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困境也是整個『現代性危機』的一部分」^①。這使得啟蒙主義對傳統社會主義的批判沒有成為對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反思，反而完成了對現代性價值的重申。另一方面，中國啟蒙主義如今面對的已經是一個資本化的社會，「在市場社會及其規則後來日益成為主導形態的中國語境中，以批判傳統社會主義歷史實踐為主要目標的這種批判已經衰亡」^②。而啟蒙知識份子儘管對社會上唯利是從的價值觀不滿，卻不得不承認「自己已經處於曾經作為目標的現代化進程之中」。所以，汪暉對80年代啟蒙主義做出如下價值評判：

中國「新啟蒙」思想的基本立場和歷史意義，就在於它為整個國家的改革時間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基礎。

不管「新啟蒙者」自覺與否，「新啟蒙」思想所籲求的恰恰是西方的資本主義的現代性。

中國啟蒙主義是中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現代化的意識形態，是當代中國市場社會的文化先聲。

這裏，汪暉的理論得以成立的兩個前提是：第一，「傳統社會主義」已經成為歷史，它不再是當下中國的問題。第二，啟蒙主義是9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化的文化先聲。這樣，他才能確立他的新目標：「把90年代中國問題的批判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批判之中。」

然而，上述兩個前提果真能成立嗎？關於「傳統社會主義」已經成為歷史的說法，我想每一個對中國政治和意識形態控制有實感的人，都能作出判斷。因此，關鍵在於如何評價80年代的啟蒙主義。

二

我認為，汪暉簡單地將80年代啟蒙主義歸為呼籲「西方的資本主義現代性」，「是9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的文化先聲」，肯定是片面的、不正確的。80年代啟蒙主義雖然把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魯迅及新文化遺產、盧梭和康德的學說、尼采和薩特的思想等理論資源綜合在一起，設立了「人的解放」的現代性目標，但這並不意味着在制度層面上選擇了資本主義。它的動機在總體上與其說是要催生資本主義，倒不如說是要修補社會主義。80年代之所以把批判對象指稱為封建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我以為除了現實策略的考量以外，更重要的是，啟蒙主義要把它與「真正」的社會主義區別開來，從而為社會主義開闢新的可能性。所以，經典馬克思主義以及二十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仍然是啟蒙主義的重要思想資源。啟蒙主義努力從社會主義中剔除極權、專制、非人性的因素，使之脫離國家主義的控制，把個人的權利、人性的觀念、民主的制度引入社會主義之中。

當汪暉強調傳統社會主義問題的「現代性」時，他的着眼點顯然是在中國問題的國際方面，在它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關係方面。而啟蒙主義則集中於理解它與中國本土歷史的關係，從中發現它與古代的專制主義的巨大相似之處。這與中國現代歷史中的啟蒙主義的方法和思路相一致。我的疑問在於，當用「現代性」置換了「本土性」後，汪暉如何描述它與中國歷史的關係？如果說，啟蒙主義所用的概念(封建主義)存在問題，那麼，啟蒙主義對歷史相似性的體驗是否不真實了？我們如何在新的語境下有效地評價啟蒙主義對中國狀況的心靈體驗？

緊接十年文革對人性的巨大摧殘，80年代思想解放的核心是人道主義。在80年代，討論得更多的是「個人性」，而非「私人性」，是個人潛能的發揮和實現，而非欲望和消費。啟蒙主義為世俗化作辯護有特定的對抗專制的動機，卻不願為全面世俗化鋪平道路，它不是啟蒙主義的目標。80年代人道主義的特質不在於它的某一固定的表達，而在於它成為一種情感、一種關懷、一種對生命和自由的尊崇。單憑追索概念背後的知識類型和來源不能判斷潮流的性質，只抓住某一種表達所用的概念與背後的知識來源，就判斷它是一種「抽象的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念」、「抽象的個人或主體性概念和普遍主義的立場」^③，進而把它與資本主義現代性掛鉤，這就忽略了它作為一種情感與關懷所包含的具體而真實的體驗。在這樣全民情感基礎上的啟蒙運動，雖然大量引用西方理論，但其核心既不是西方古典也不是西方現代的，而只能是80年代中國的。從消極的方面講，啟蒙主義所運用的概念，它所指涉的對象與它的原初內涵之間，往往有着不可抹平的差異性，西方的知識與本土狀況之間總橫互着難以超越的距離。用西方概念來概括後發國家的思想狀況，只能是臨時的、權宜的。當啟蒙主義訴諸「個人」、「人性」的概念來對抗專制主義時，它背後站着的並不一定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

三

汪暉避而不談的另一個「土本」的事實是：9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的前提是掃除80年代啟蒙主義思想。與

80年代不同，90年代迫使知識份子在制度層面上作出選擇，尤其經過了起初幾年的所謂「極左」回潮，一些知識份子至今仍然認為它陰魂不散，對它心有餘悸。這使資本主義市場化運動獲得不少知識份子的同情。即使隨後暴露出許多問題，他們還是採取「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現實原則」，並把希望寄託於將來，而「保守主義」與新權威主義在批判啟蒙主義的過程中成為90年代的市場意識形態。他們討伐平等與民主思想，證明它們只會帶來災難後果，只認可經濟範圍內的喪失任何光環的自由，來為當代市場化進程開路，進而認可這場大規模的市場化運動在沒有起碼的民主監督、沒有起碼的公正理念的狀態下進行。另一些知識份子則退回書齋，這本來是由於環境的壓力和言論空間的極度收縮，但也獲得了時間去思考知識份子的過去與將來。然而，他們卻在這段時間裏完成了對啟蒙主義的「反動」。他們也從批判啟蒙主義入手，豎起了「學術」的旗號，藉口改變80年代學術的非獨立性，把學術與外在世界完全分割開來，所謂「學術規範」的實質是要抽去啟蒙主義最寶貴的情感與關懷，把精神與價值問題從人文學科中驅逐出去。這裏，恐怕有更多的資本主義「現代性」。

汪暉把1994年出現的「人文精神」提倡者稱為「一些堅持啟蒙姿態的人文學者」^④，我頗有同感。在我看來，「人文精神」的提出是啟蒙主義的情感和關懷在90年代遭壓抑後的反彈，它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而首先是情緒積澱後的爆發，它力圖把被學術規範驅逐的精神與價值問題重新拉回思考的中心，並重建讓學者們厭倦和輕視

的文化批判和社會批判。人們從中嗅出所謂反市場化的氣息，它無疑與「反現代的現代性」思想有聯繫。「人文精神」的爭論逐漸展開後，各種反資本主義情緒都附和上來，以致於「傳統社會主義」話語也屢有出現，但謹慎從事者要面臨如何保持既針對90年代發言又對過去清醒的批判態度，這並不容易，所謂「失語症」就在這裏出現。中國知識份子的深刻的當代困境在於：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現狀與傳統社會主義歷史之間，在思考全球狀況與堅持本土批判之間，知識份子如何診斷問題，如何發言？在知識的運用上，能否找到堅定的立場和理論同時對晚期資本主義文化、傳統社會主義以及變化過程中的中國進行批判和闡釋？資本主義化的到來使馬克思主義得以復活，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受到質疑，但對同樣因此而膨脹的民族主義的警惕和對「傳統社會主義」的陰暗記憶，使人們不願完全放棄自由主義，並有理由懷疑尚未有效闡釋「傳統社會主義」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如果說，汪暉的這篇文章標誌着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缺席狀況的改變，那麼，新一輪的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話才剛剛開始。我認為，這種對話只有在確立了雙重前提後才會有效：我們既面臨全球資本主義的問題，又面臨「傳統社會主義」及其當代轉型問題，後者絕不能消失在我們的視野外。

汪暉這樣批評和要求啟蒙主義^⑤：

對內，它沒有及時地把對國家專制的批判轉向在資本主義市場關係形成過程中國家—社會複雜關係的分析，從而不能深入剖析市場條件下國家行為的變化；對外，它未能深刻理解中國

的問題已經同時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問題，因此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必須同時也是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其問題的診斷。……中國新啟蒙主義話語面對的新的問題，是如何超越它的原有目標對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中國現代性問題進行診斷。

當汪暉認定90年代中國已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中，市場社會及其規則日益成為主導，國家及其功能發生了極其重要的變化的時候，我的疑問在於，90年代的社會關係是否「都需要置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特別是市場關係中來觀察」^⑥，然後才可以明瞭的？我們如何看待其中不變的政治結構、狹小而被分割的言論空間、固守了幾十年未見動彈的文化教育，以及仍然發揮作用的意識形態控制？這些都是無法用市場規則闡明的，但卻被汪暉忽略不計。然而，這正是啟蒙主義所關注的問題。

汪暉對全球資本主義狀況的強調是非常有意義的，他準確地批評了啟蒙主義缺乏全球資本主義的批判眼光。至於他自己的理論，在與西方知識界對話、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進行批評的同時，如何能夠落實在對本土的權力—奴役關係的揭示上？如何避免喪失對中國內部批判的針對性？如果只關注全球化問題，其批判前提可以設定在90年代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一部分這個事實上，那麼要針對中國本身發言，就需要回答中國為甚麼由「傳統社會主義」轉化到市場主義。除了外部世界的原因與知識份子的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政治、經濟原因是甚麼？在這個轉化過程中，它堅持了甚麼、放棄了甚麼？它如何「開

放」？它的「開放」與啟蒙主義要求的開放有甚麼不同？當汪暉說啟蒙主義不得不承認自己已經處於曾經作為目標的現代化過程中時，他把兩者的巨大差異抹平了。汪暉以對全球化事實的強調與對啟蒙主義的批判代替與迴避了這些問題。因此，問題可以用相反的方式提出：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其問題的診斷如何同時也是對中國問題的診斷，而不是把中國問題僅僅作為診斷資本主義問題的材料？當汪暉強調資本主義化帶來的國家的功能和行為的變化時，我願意強調它前後有很大的一致性；當汪暉強調啟蒙主義必須「轉向」和「超越」的時候，我願意強調如何承繼80年代這份也許不太深刻的啟蒙主義遺產。我想對汪暉的話稍作修改如下：中國啟蒙主義的問題是如何及時把對國家專制的批判結合進對資本主義市場關係形成過程中國家—社會複雜關係的分析，從而對新階段的中國現代性問題進行診斷。

在沒有找到統一的理論與立場的現在，知識份子不得不艱苦而困難地保持一個「兩面作戰」的「橫站」（魯迅語）姿態。

註釋

①②③④⑤⑥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天涯》，1997年第5期，頁133-50。

薛毅 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文學評論家。